

## 试评姚锡光《东方兵事纪略》

廖宗麟

姚锡光，清末江苏丹徒人，宣统时曾任陆军部侍郎之职。据他在《鹿腴丛钞》中记载，他微时久居天津，虽然适馆，但留心国内外大事，“于东西诸国之强弱，其兵轮战卒之良楛，及其国之山川、道里、风俗、政令粗知崖略”，<sup>①</sup>因而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及淮军将领所知。后因亲丧回江苏守制。甲午中日衅起，淮军将领历述李鸿章意旨，再四电招，姚锡光遂北上天津，为李鸿章的门下客。在此期间，姚锡光对于军事措置曾有所建议，其中四条：一、积极干预朝鲜事变；二、动用卫汝贵所部盛军以抗衡日人，即所谓“是岁四月，朝鲜东学党事起，日人嚚然思逞，尚冀我未发。于是锡光矚知其情，密谒合肥相国，力请以我海军全部翼小站防营盛军万人而东，分护其王京及仁川海口，以争先著”<sup>②</sup>云云；三、大军自陆道至朝有水陆各半者，“由大连湾之东北隅大东沟登岸，亦百二十里至九连城，较出山海关近五百里。”<sup>③</sup>四、屯军平壤自固，不与日军浪战，以老彼师，“是我已据朝鲜腹地，有拊背之势，而日人汉京之把持、海口之梗塞，皆同虚设，敌谋可不伐自破已”<sup>④</sup>等都与李鸿章后来的军事部署相合，可见李鸿章曾注意和采纳了姚锡光的这些建议。

虽然姚锡光急于自售，但是，可能是由于他的地位低微或是交情较薄，因而李鸿章对他的态度仍有很大的保留，一些重要的军事机密，如清政府的备战活动等，都没让他参与。姚锡光见不

被亲信任用，于是就在平壤、旅顺等役败绩，李鸿章屡遭惩处，丧权失势之时，借口与北洋同事诸公同兹甘苦，在十月初辞别李鸿章，离开天津，道大沽、新城，历北塘、芦台、洋河口等地，协助守将规划防务。葺事后，他又东行出关，到辽左一带视察军情，直到甲午腊尽始返回。时李鸿章已被摘去三眼花翎、褫夺黄马褂、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，成为言官参奏的主要靶子，世人皆曰可杀，前途险恶。姚锡光赶快另找门路，应山东巡抚李秉衡的“再四电招”，于乙未年初来到山东，投到李秉衡的幕下，这时已是威海卫失陷、李秉衡率兵溃往莱州时的事了。

战后，姚锡光就其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，并参考了中外的一些记载，如李鸿章和清政府及官员的来往电报、当时朝臣的奏章、易顺鼎所著《盾墨拾余》、聂士成所编《东征日记》、蔡尔康撰写的《中东战纪本末》、以及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等资料，编撰成《东方兵事纪略》一书，于光绪丁酉年（公元1897年）在武昌自刊出版。其后，翻刊本甚多，在社会上广泛流传。

对于此书，文廷式在《闻尘偶记》中评论道：和记述甲午中日战争的其他野史杂闻相比，姚书显得“较翔实矣”<sup>⑤</sup>，刘声木在《菴楚斋随笔·五笔》中也推许道：“窃谓言中日战事者，实以此书为佳，叙事固翔实，文笔亦雅洁，迥非他书所可比拟。”<sup>⑥</sup>可见影响之大。

长期以来，我国史学界不少人在研究甲午中日战争史时，都将姚锡光的《东方兵事纪略》当作信史，不作详细缜密考证便广泛地加以引用。其中，如《清史稿》、王芸生所编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一书解放前后的两个版本、著名史学家范文澜、郭沫若、翦伯赞等人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中有关甲午战争的章节，都只是简单地把姚书的记载加以转抄辑录而已；中国史学会所编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中日战争》，也把姚书放在第一册首篇的显著地位，并加编者案谓：“这部书写的相当全面，其中虽不免有

些讹误，但很有参考价值。”<sup>①</sup>《中国近代史词典·东方军事纪略》条目，也谓“本书对战争双方的决策、重大战役的经过……均有翔实记载”，是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重要参考资料。<sup>②</sup>这些情况，都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甲午中日战争史的研究工作，史学界关于某些人物和事件所形成的一些流行观点，往往都是从姚书中寻找根据的。

那么，姚书真的有这么高的学术价值吗？

不容讳言，作为一部早期的开拓性著作，《东方军事纪略》并非毫无价值。姚锡光熟习军事，观察用心，因此，对于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海陆诸战役，都能抓住要点，描述其起始结局，从而勾勒出战争过程的大致轮廓，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；同时，作者参予战事，身历其境，对于当日奉东、辽东、山东各战场的山川地理形势、道路村落远近，以及旅顺、大连、威海卫各海军要防的炮台堡垒的建筑沿革和武器配备等情况，均有细致详尽的描述和记载，可以弥补一般史料记载的不足，为后世学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。

然而，写史要以事实为依据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事皆有本，录必有据，万万不能道听途说，根据不可靠的传闻去随意编造历史，以讹传讹，贻误后人。遗憾的是，姚锡光在撰写《东方军事纪略》一书时，并不能严格地遵循上述原则，结果，书中就出现如下一些现象：

1. 姚书编成较早，当时《李文忠公全书》、《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》、《光绪朝东华录》、《清德宗实录》、《盛宣怀档案》等重要的档案资料尚未公布发行于世，姚锡光在写书时虽然掌握了一些资料，但是很不充分，很不全面，甚至断断续续，支离破碎。当他根据这些不完整的资料作出判断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发生错误。例如，他在书中谓甲午八月平壤之役败绩后，清政府始起用湘军诸将，却不知道早在六月间，清政府便已起用湘军

宿将、前新疆巡抚刘锦棠，欲用为东征前敌统帅，七月间，又令吴大澂、魏光燾等人统湘军北上助战。

2. 由于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不足，姚锡光往往借助第二手资料以作补充，但又偏听偏信，不作细致的核对查实，便轻率地大量引用第二手资料入书，以讹传讹。如聂士成的《东征日记》，经由李宝森为之整理选出，不免有传抄之误，其中记十二月“请率精兵出敌后游击”的电文，与收入在《李文忠公全书》的原电不尽相符，且关键字句有错记者。如原电谓游击敌后可使日军“首尾难顾”，《东征日记》错为“首尾兼顾”，<sup>⑨</sup>姚锡光照抄照引，而不察其文义不通。又如张之洞当时署理两江总督、南洋大臣，远离京师，对于战事，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弊。如其在电文中，曾将乙未四月日本允展换约期限五天错记为“七天”，姚锡光在述及此事时，并不查对有关原电，却抄引张之洞的电文入书，仍误为“七天”。<sup>⑩</sup>

3. 写作粗率，不够认真负责。姚锡光自诩知兵，又久在津门，上至李鸿章、下至淮军诸将，皆与之交接，早已熟悉，然而，在其书中，却把宁夏镇总兵卫汝贵误为“大同镇总兵”，<sup>⑪</sup>刘盛休所部铭军八营误为“十二营”、经远舰管带林永升误为“林翼升”、超勇舰管带黄建勋误为“黄炯臣”，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

由于姚锡光在取材和写作上存在着以上的问题，就使他的书中不免出现许多重大的失误，因此，当我们根据档案材料去考证书中的记载时，可以发现许多人物和事件都遭到了严重的歪曲，以致失去了原来的真实面目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：

一、中国方面指挥这场战争的是清政府，关于战争的重大决策都是由它来决定的。因此，准确地反映清政府的活动，是我们了解战争进程和成败得失的关键。但是，姚锡光由于地位低微，未能参予重大的军事机密，难以窥知清政府的战争内幕。当他强

不知以为知，勉强撰写有关的内容时，就不免捉襟见肘，力不从心了。连文廷式也曾批评他：“详于阌外而略于朝廷”<sup>⑫</sup>。

例如，备战不足是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，这样重大的失策是怎样发生的呢？在姚书的《衅始篇》和《议款篇》中，姚锡光以占全书十分之一约七千字的篇幅，反复地指责清政府和李鸿章不早为战备，“其始固委蛇言款，盖不得已而出于战，当道原无备战之心，识者固知兵气之不振。”<sup>⑬</sup>“方六月中旬，王京危逼，我驻朝道员袁世凯回华，中国始为战备。”<sup>⑭</sup>

其实，日本侵略野心的完全暴露是在五月十六日，六天后，光绪帝就已经密令李鸿章备战以应变。受命后，李鸿章一面在北洋海陆军中作了军事动员，部署开赴朝鲜对日作战，一面于五月二十七日上奏了《酌度倭韩情势预筹办理折》<sup>⑮</sup>，提出择帅、募兵、筹饷、加强北洋舰队等四条备战措施<sup>⑯</sup>。览奏后，光绪帝将它发交海军衙门和户部会同妥议复奏，六月初九日，光绪帝正式批复李鸿章提出的备战方案<sup>⑰</sup>，这就是清政府备战的简单经过。据此，可知早在五月下旬，清政府就已着手备战，并非迟至六月中旬才被迫备战。

清政府在何时开始酝酿对日求和，这是甲午战争中的一件大事。在《议款篇》中，姚锡光认为在甲午十月，“大连湾且堕，而款议复起。”<sup>⑱</sup>实际上，清军和平壤之役败绩后，慈禧太后曾派翁同和去天津找李鸿章询问战事，当知道毫无把握取胜之后，便已有意向日求和了。九月初六日，被重新起用的恭亲王奕訢就有函指示李鸿章，要他设法通过英、俄两国使节与日本接洽议款事。十四日，李鸿章报告了与英、俄使节交谈的详细经过<sup>⑲</sup>，十六日，清政府讨论了李鸿章的报告，只因日本的要求太奢，事情才搁置下来。可见款议之起是在九月初，而不是在十月中旬大连湾陷落之后。

二、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是个丑角式的人物，对于清军战

败、丧师失地负有很大的责任，因此，实事求是地反映李鸿章的全部活动经过，有助于深刻地认识和揭露他的卖国贼嘴脸。但是，姚锡光却不是这样做，他在甲午战起之初曾投到李鸿章的门下，希求一个进身之阶，却未被李鸿章重用，所求不遂，颇怀怨望。于是在写书提及李鸿章时，不是严格尊重史实，而是以个人好恶为转移，不惜捏造事实，把李鸿章简单地丑化，却忽略掉许多重大史实内幕，从而造成很大的混乱。

例如，在《援朝篇》中，姚锡光写到：五月十七日，“驻朝总办道员袁世凯电戒志超，速请北洋拨海军战舰来仁川助声威，并添陆兵驻马坡，志超电请北洋，鸿章不报。”<sup>②</sup>从而指责李鸿章贻误军机。其实，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渐暴露，中日矛盾逐渐激化，五月十六日，袁世凯便电告李鸿章，建议“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，续备陆兵”，李鸿章马上派出镇远等舰赴仁川，为牙山清军聊助声威；同时电请总理衙门“应否添重兵往拒？”准备一俟回电批准，即派卫汝贵率盛军精锐三千赴援牙山<sup>②</sup>。但是，总理衙门在十七日的复电中谓：“似宜电袁，喻以镇静”<sup>②</sup>，驳回了李鸿章添兵拒敌的要求，事遂不果行。因此，清军没能及时增援牙山，以致贻误战机，主要责任并不在李鸿章身上。

在甲午海战中，北洋舰队由于执行了一条“避战保船”的消极方针，因而屡遭败挫，最后全军覆没。是谁提出和执行这样的一条方针呢？姚锡光认为是李鸿章，他在《海军篇》中写道：十月中旬，“旅顺日益危逼，汝昌知旅顺堕则北洋门户失，大局震惊，罪且不测，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，决死战。鸿章晋之，谓：‘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，余非汝事也’。二十五日，旅顺陷，船坞沦于倭，海军根本拔，遂褫汝昌职。”<sup>③</sup>自此说一出，后出各书无不沿用，影响很大。

其实，在九月下旬，当日军从皮子窝登陆时，李鸿章于三十日命令正在威海游弋的北洋舰队回防旅顺。十月初一日，丁汝昌率

舰队返回旅顺；初二日，又驶抵大连湾布防，但很快又擅自退回旅顺；初十日，在大连湾失陷前夕，丁汝昌带着舰队从旅顺前敌擅自撤回威海，为此，他受到光绪帝的严厉训斥。十一日，因旅顺危急，李鸿章命令丁汝昌率舰队来天津，商量赴援旅顺事。十三日，北洋舰队遵命驶达天津，当天，李鸿章批准丁汝昌提出的赴援方案。十六日，丁汝昌率舰队抵达旅顺，同日，再次擅自撤回威海。事后，清政府在追咎失守旅顺的责任时，以“救援不力”的罪名将丁汝昌“革职拿问”<sup>④</sup>。其间，并无李鸿章压制丁汝昌要求赴援旅顺的事情。

此外，如在《议款篇》中，姚锡光谓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，“会我中外诸臣亦连章阻款议，朝廷意犹豫。乃鸿章遣伍廷芳迎驻津倭领事于大沽，密令其速电东京，促我换约。”<sup>⑤</sup>其实，在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，日本驻华公使及领事均已于七月下旗回国，至次年五月始复遣来，故在《马关条约》尚未交换之前，日本不会再有驻津领事在大沽活动。又如同篇谓王之春受命使法，与法政府谈判“质合于法”事，议垂成，而为李鸿章、龚照璠败之。其实，自《马关条约》传出后，俄、法、德三国即出面干涉，不允日本割占辽东，法政府且因清政府有“质合于法”的建议，曾想占台湾以胁日本。但因日本很快就表示愿意屈服，答应退还辽东给中国，法国也就打消占领台湾的念头。其间，虽然王之春衔命留法，但法政府未及与议即罢，姚书所谓议垂成而为李、龚败之的说法，不符事实。

三、在甲午战争中，由于清政府在备战不足的情况下，仓促命令清军对日开战，从而使清军落入统帅乏人、粮械不供、后援难继、军饷匮乏的窘境之中，避免不了战争失败的必然结局。但是，清军将士出于爱国热忱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浴血奋战，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军，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场面。可是，姚锡光不去歌颂和表彰清军将士的爱国精神，反而把许多勇敢杀

敌的爱国将领，丑化为怯懦无能之辈，严重地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例如，在《援朝篇》中，姚锡光谓在平壤决战前夕，“志超将冒围北归，宝贵不从。宝贵虑志超遁去，以亲兵守之。”<sup>②</sup>

其实，在平壤诸将中，叶志超官居直隶提督，是朝廷明令任命的“平壤诸军总统”，尊为主帅；而左宝贵只是高州镇总兵，算是偏裨之将。在决战前夕，偏裨之将以亲兵监守主帅，不论其理由如何，均形同反叛，以左宝贵的忠勇性成，当不会出此下策。事实上，在平壤之役中，叶志超力疾督战，指挥诸将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，在决战之时，他并亲自坐镇江自康的仁字营中，与左宝贵所部奉军共同防守平壤城北防地，最后，只是由于左宝贵战死，奉军阵地崩溃，被日军乘隙突入玄武门，清军面临后路断绝的危险，叶志超才被迫与诸将定议冒围北归，撤离平壤。而根本没有在决战之前即欲临敌脱逃，以致被兵监守的事情。<sup>③</sup>

又如在《辽东篇》中，姚锡光谓在牛庄之役时，湘军魏光焘、李光久等部十一营宿于庄内，“方倭人之将至也，光久部下某以告，请速出队。光久吸鸦片未已，复待卒早餐，倭已尽入市，”<sup>④</sup>遂至大败。李光久被描绘成一个腐败已极的军官。但是，事实却完全相反。牛庄之役前，魏光焘、李光久均率所部会诸军围攻海城。二月初七日，日军偷袭牛庄，魏光焘闻警率军回救，被日军包围在庄内。初八日，李光久率本部从海城前敌回援，及抵牛庄时，魏光焘军交战已久，被日军攻入牛庄，李光久见情势危急，遂饬所部各营分兵三路攻打日军，展开殊死搏斗，终因众寡不敌而败绩。李光久是在行进中投入作战的，并无在临敌之际尚吸鸦片吃早餐等事<sup>⑤</sup>。

又如在《山东篇》中，姚锡光谓：十月间，“倭氛渐逼，戴宗骞思脱身去威海。适有倭人将自龙门港登岸之信，宗骞遂请以

威海防交巩军分统刘朝佩，而自率绥军出为游击军。丁汝昌、刘朝佩侦知之，力请于鸿章，阻其行。”<sup>⑩</sup>把戴宗骞也写成想临敌脱逃的胆小鬼。

其实，在旅顺失守前，威海陆路守将戴宗骞曾和丁汝昌联军向李鸿章报告防务，认为绥军只能守近岛，不能远剿百里之外，如果日军来犯，海陆守军准备在港内配合作战，“骞力战，昌力援”而已，尚无自率绥军出为游击军的打算。只是在旅顺失守后，戴宗骞预感日后日军进攻威海，将会沿用袭取旅顺的故伎，从远处海岸登陆以攻打威海后路，于是，遂对威海防务产生了新的想法，“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”，对登陆日军实施“半渡而击”，以取得最大的杀敌效果。开始，李鸿章曾怀疑他的这种想法是欲“临敌脱逃”，故严加训斥。后来，当获悉日军准备从荣成登陆以攻打威海后路时，李鸿章才转而支持戴宗骞的出击计划。但是，又因遭到了丁汝昌的多方阻挠而未果行。在威海之役中，戴宗骞放弃了几次可以外撤的机会，最终自杀殉国，说他“思脱身去威海”<sup>⑪</sup>是不符合事实的。

四、在极力贬低和抹煞清军将士抗敌勋业的同时，姚锡光却有意无意地为敌张目，渲染和夸大日本侵略军的战绩。

例如，在《援朝篇》中，姚锡光谓平壤一役，日军缴获清军的“毛瑟枪万数十杆”<sup>⑫</sup>。其实，由于清军是在备战不足的情况下作战的，因此参战五大军中有的枪械不足，如左宝贵部和叶志超部都缺乏大炮和步枪。在作战中，各部清军都损失了一些枪械，损失最严重的奉军两部尚余枪械三、四成，卫汝贵盛军尚余八成，马玉昆毅军和叶志超部则未报损失，据日军记载，他们缴获的枪枝仅止“一千一百六十五枝”<sup>⑬</sup>，只达姚书所载数字的十分之一。

又如在《金旅篇》中，姚锡光谓日军攻占大连湾时，曾缴获“大小炮弹二百四十六万数千颗，枪弹三千八百八十一万数千颗。

”<sup>⑭</sup>在这里，日军缴获的炮弹以百万计、枪弹以千万计，显然是夸大，连范文澜同志也指出：“枪弹数目也许不确”<sup>⑮</sup>。

除了上述所举一些较为重大的错讹外，该书对于甲午战争的许多事件的发生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过程和细节的描述，都有不少失实之处。从这部书中，人们只能获得对于甲午战争的模糊印象，而不是精确的史实。

综上所述，可知《东方兵事纪略》一书并不是一部严肃的历史著作，学术价值不高。九十年来，许多人都把它当作研究甲午中日战争的权威著作，我是不同意的。

注：

①②③④⑤⑥⑫ 《中日战争》（5）

⑦⑨⑩⑪⑬⑭⑱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 《中日战争》（1），

⑧ 《中国近代史词典》页158—159

⑮⑳ 《李文忠公全书·电稿》卷15

⑯⑰㉑ 《中日战争》（2）

⑲ 《中日战争》（4）

㉔参阅拙著《丁汝昌和旅顺之役》1982年第1期《复旦学报》。

㉕参阅拙著《叶志超和平壤之役》1984年第5期《历史知识》。

㉖参阅拙著《李光久和牛庄之役》1983年第1期《社会科学辑刊》。

㉗参阅拙著《戴宗骞和威海之役》1984年第6期《安徽史学》。

⑮范文澜《中国近代史》（上）页256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